

2016年10月15-16日

女性学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暨公共政策研讨会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

中国妇女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西藏大厦

开幕式

魏开琼教授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 系主任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的到来！

2016 年对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截至今年女性学系建立 15 周年了。经过近一年的筹备，由我系和我校的中国妇女发展研究中心合作举办的女性学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暨公共政策研讨会今天在西藏大厦隆重召开！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出席本次大会以及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专家和学者。她们是：中华女子学院校长刘利群教授、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张立副主任、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杜洁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外妇女研究中心魏国英教授、中国妇女报副总编禹燕老师。出席今天大会的还有来自丹麦、美国、中国香港以及中国内地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在实践领域的专家学者共 100 多人，在此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今天上午的议程主要有以下内容：一是请中华女子学院校长刘利群教授致欢迎辞，二是请主席台就座的嘉宾们发言，三是请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就女性学学科和公共政策做相关的主旨发言。

致辞



（左起）魏开琼教授、魏国英教授、刘利群教授、张立女士、
杜洁女士、禹燕女士

刘利群教授

中华女子学院 院长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校友还有我亲爱的同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首先代表中华女子学院党政领导和全体师生员工向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以及远道而来的各位朋友、各位学者、各位校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同时我也要代表学校领导，向我们女性学系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节日的祝贺。

北京已经到了最美好的金秋季节，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和美好的时刻，我们在这里召开“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 15 周年女性学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研讨会，同时也同期召开“性别与公共政策”的研讨会。我认为将这两个研讨会合在一起召开是在共同探讨两个主题：一是如何推进女性学学科的专业建设和发展，二是如何通过具有性别意识的公共政策的实施来更好地服务妇女和儿童。我们用这样两个研讨会的形式来纪念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成立 15 周年，探讨我们怎么样培养人才，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我觉得这种形式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和价值的。

回想起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的成立，它是应时而生、恰逢其时的！在座的各位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都知道女性学是一门研究女性知识体系的独立学科。这个独立学科是跟世界妇女运动和妇女理论发展

息息相关的，也是深化中国女性研究和发展妇女运动的客观需求，还是唤醒女性觉悟、提升女性素质、推动男女平等的有效途径。在中国，女性学研究从 80 年代起步，到 90 年代研究者就提出开展妇女理论建设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因此，国家教育部在 1998 年批准北京大学将女性学纳入到国家研究生的专业目录中，自此女性学成为高等教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2001 年中华女子学院成立了女性学系！这是女性学在中国大陆设立的第一个本科专业。2006 年，我校女性学系面向全国招收本科学生；2010 年，我校将女性学列入到招收一本学生的行列。我校的女性学专业是目前国家教育部批准的本科第一批录取的专业，也是教育部和北京市特色专业的建设点，所以学校对女性学专业和女性学系都非常地关心，历届领导班子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2016 年初中华女子学院进行了第八次重新聘任的规划，原本与社会学系、社工系在同一个学院里的女性学系在这次全员聘任后独立出来，成为与学校其他院系平级的一个系。

以上是对我校女性学系历史的简单梳理。虽然我校女性学系成立只有 15 年，但是我们对女性学相关内容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

上世纪 80 年代，中华女子学院就对女性学的学科专业建设以及实践有了一系列的探索。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82 年到 1992 年，这一阶段是对现实妇女问题的关注以及编写教材；第二个阶段是 1993 年到 2000 年，倡导社会服务和提高行政管理能力，特别是对妇女

学进行了机制化的反思和探索；第三个阶段是 2001 年到 2005 年，重点探索人才培养的规律，进行学科制度化建设；第四个阶段始于 2006 年我校开始招收本科生，同时举办相关的研究班，开设女性学专业，希望通过系统教育来填补学生的性别盲点，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升学生的性别意识和性别的判断力和分析能力。

15 年来，我校女性学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两百多名毕业生从中华女子学院走向了社会。她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进入到更好的、更高层次的院校去读研究生、博士生，还有一些人在联合国下属的、与性别相关的机构或是全国妇联相关的组织机构中工作，此外还有进入大专院校的……不管在哪里，这些毕业生们正努力地为妇女发展和性别研究做贡献，在分析性别和文化传播、女性学教学管理等相关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同时，我们也看到女性学系建立 15 年来，除了致力于人才培养的相关工作之外，也聚焦于本土的妇女理论和妇女运动相关的研究。我校女性学系的教师队伍虽不强大，却是一支非常优秀的队伍，聚集了一批著名的、优秀的老教授和中青年的骨干教师，也是学校非常宝贵的一批从事性别研究、女性研究的人才。15 年来，女性学系的教师们发表了 200 多篇论文，开展了近 100 个研究课题，出版了 40 多本著作，还进行了 25 项教改项目，获得了 20 多个科研成果奖项。另外教师还通过对公共政策的研究，参与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的讨论，参与决策或为决策咨询提供参考，比如说年初颁布的反家庭暴力法和婚姻家庭的建设等等政

策当中都能看到她们的身影和学术思想。

尽管在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是由于我校女性学专业历史还比较短，所以还需要大量校外专家学者的支持。因此女性学系一直通过“女性学讲堂”和其他活动形式邀请校外的专家学者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士走进课堂，与学生分享自己的研究和经验。今天在座的许多专家学者，都在这 15 年中为女性学专业的建成、发展和人才培养做贡献，分享了你们宝贵的思想、智慧和经验，非常地感谢你们。在此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对 15 年来一直关心支持女性学发展的各级领导、还有各位学者、各界朋友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同时我也要向女性学系多年来耕耘在一线上、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做出贡献的各位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祝贺！

我们也期待着女性学系的各位老师更加注重培养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跨学科知识和具备性别平等意识、性别分析能力和行动力的优秀女性人才，希望女性学专业朝着建设一流学科的目标不断迈进，开拓更加广阔的学术前景。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也预祝我们的研讨会圆满成功。祝各位来宾各位学者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大家！

张立女士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 副主任

首先非常高兴参加这两个主题的研讨会，与在座的各位专家共同探讨我国男女平等国策贯彻落实的方式和途径。我认为有一些突破口和制度的设计在文化领域和教育事业，所以本次会议非常重要。

刚才听完利群校长的致辞，深感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成立 15 年来，培养了大批女性学人才，现在这些人才至少在中国，特别是理论界是骨干力量，也成为落实男女平等的中坚力量，这是可喜可贺的，再次祝贺！

今天的主题是贯彻男女平等，这是一项重要工作，是促进决策的落实、建设社会主义性别平等的重要举措，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内容，意义重大而深远！下面我谈三点意见：

第一，推动女性学学科发展的人才培养，是教育领域贯彻男女平等的一项重要工作。1995 年在联合国第 14 届妇女大会上，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男女平等的决策，这一决策于 2001 年写入中国第二个妇女发展纲要的总目标，到 2012 年又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上、在促进性别平等发展的历史中都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飞跃。什么是男女平等？墨西哥宣言指出，男女平等是指男女尊严和价值的平等。我们今年到各地去评估的时候，大家都谈论男女平等，认为在中国没有任何性别歧视。一些男性领导干部会说“你

看我的工资高于她（妻子）”，而很多女性会认为这样没什么不对，这就是个问题，没有充分考虑到女性在家庭创造的价值。在男女平等的问题上，我们在理论界的探索和在实践中发现，我个人认为还处在两个层面。所以妇儿所从去年开始写了一本书，探讨我们真正要解决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的问题。这本书有六章，第一章是理论，男女平等到底是什么以及它的发展和形成；第二到第五章是习主席在讲话时的“四个贯彻”，首先从理论上理顺男女平等的基本决策，让人们从思想上、观念上、文化上来认识这个问题。比如现在网络上流行的词“女汉子”，为什么会有这个词？女人聪明能干就像男人一样，就说这个女人是“女汉子”，认为能干是男人的标准。还有女人“头发长见识短”，男人成功背后有一个女人等等，我觉得这就是男尊女卑！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创造人民的伟大力量，社会进步可以女性的社会地位来比。男女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同我国妇女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女性学科建设发展的一个创新，女性学课程就是要在教育领域贯彻男女平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揭示了妇女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辩证关系，揭示了妇女与男性平等和谐发展的关系，以及妇女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推动女性学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贯穿 2011 年到 2020 年中国妇女发展，这项重要工作在教育领域提出三重目标，今天这个研讨会的主题与三个目标都直接相关，所以今天的会议是贯彻中国妇女发展纲的一项重要工作和举措。这个纲要颁布以后除了各高校开设女性学课程以

外，在黑龙江、上海、广东，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都要推进性别平等课程。比如说怎么给二年级上音乐课？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怎么理解？老师会设计一个小熊让它邀请舞伴，请同学们举手回答小熊的性别，我们看看七岁孩子的性别观是什么样呢？多半还是女孩子举手，可想文化的渗透多么厉害，一个七岁的孩子就会认为那个小熊一定是男孩，要请的一定是个女孩，老师就会讲这个小熊既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男性女性都可以作为跳舞的邀请方或者被邀请方。我们最近正在编写一个国家教育工作的性别平等的手册，在山西、山东、贵州等五个省启用，并且明年会全面推广。我们觉得尽管从大学培养很重要，但是到了大学，人的性别意识基本上形成了，改变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应该从儿童抓起。

第三，性别与公共政策研究也是贯彻妇女纲要的一项重要工作。妇女纲要和法治领域提出了一项重要目标，即加强对性别平等的审查。我们去年对妇女纲要做的项目梳理，会形成一个综合报告报国务院，其中策略措施里提出要对男女平等的内容进行审查，这也是立法的规定。从2012年开始，各地积极探索建立，现已有24个省区市建立了审查制度，其中有八个省区市在县一级已经建立并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从制度上消除了性别歧视。性别与公共政策的研究，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的探索是并驾齐驱、共同推进的，促进男女平等的贯彻落实。

总之，全面推进男女平等的落实，既要从完善国家法律制度上着手，更要从文化管理改革上着力，文化塑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论是在大

学开展女性学学科课程还是在中小学开设性别教育课程，都是文化的创新，这是一个漫长的历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是我国“五位一体”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意义重大。最后，预祝我们今天的会议圆满成功，谢谢！

杜洁女士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副所长

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站在这里，仿佛回到了家里一样！因为我看到在座的很多老朋友，其实他们都是我们研究所的编外研究人员，因为我们一起合作了很多的会议、活动和研究，决策参与中也都有大家的身影。所以今天到这儿来，我就特别的高兴。女性学系的建立，我也是一个见证人，但是我今天突然觉得这 15 年其实就是一瞬间，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其实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也取得了很多成绩。

刚才利群院长讲话的时候我觉得她特别谦虚，我作为观察者，对女性学系有三点评价：

一是女性学系自成立以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对于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了很多有影响的研究，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和运用。例如参加反家暴政策的讨论、起草一些重大的研究文案，为国家及妇联工作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

第二是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积极吸取世界妇女研究的成果，扩大与国际的交流合作，共同开展研究项目。她们参与了很多国际会议，努力讲好中国的故事。今天的研讨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国内外各行各业的专家聚在一起，共同探讨政策与学科发展。

第三是广泛凝聚力量，不断增强凝聚力，搭建平台和桥梁，团结很

多的专家学者，特别是跨学科的学者，共同进行交流与合作。今天我看到很多的跨学科的学者都来参会，这也体现了女性学系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现在有很多的高校都开了女性学课程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有什么特点呢？我认为有几个“最”，第一它是离妇女工作最近，因为全国妇联对很多妇女工作的开展有重大的意义，而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相当于一个智囊。第二是离妇女工作者最近，因为她们直接培养了妇女工作者，很多毕业生都从事了妇女工作。第三是离决策最近，因为我们研究所离决策很近，而我们之间有许多合作研究，可以说她们直接参与了很多妇女、性别平等的政策法律的制订。第四是离实践最近，她们直接参与妇女发展和妇女工作实践，这就决定了中华女子学院的女性学系有自己的特色，与其他高校有所不同。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提出要不断的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这为妇女研究成为一个跨学科的重点社会学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我们现在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妇女学还没有成为跨学科社会科学里面重大的点，需要我们在座的各位的共同努力。所以我特别希望中华女子学院的女性学系担当这个重任，在跨学科建设中抓住这个契机，为国家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增长点做出努力。我们妇女研究所也愿意共同合作，促进妇女学的研究发展。

我期待女性学系不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都具有更强的吸引力，更大的凝聚力，更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谢谢大家。

魏国英教授

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

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大家好！在这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建立 15 周年的喜庆日子，我谨代表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向中华女子学院、向女性学系的老师、同学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15 年来女性学系在学科建设上做出的卓越贡献我们至今记忆犹新。新世纪之初女院开风气之先率先成立了女性学系，举起了建设女性学学科的大旗。2006 年设立了女性学本科专业并招收了 30 名学生，使女性学堂堂正正地走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序列。2012 年在学科建设的低靡困惑之时，女院召开了女性学学科范式和学科地位的研讨会，牵头组织北京十所妇女研究机构提出了女性学学科制度建设的八点建议，发出了来自高校基层的推动学科持续发展的呼声。这一系列创新之举凝聚着女院历任领导和女性学系几届师生们的胆识、智慧和心血，这一系列创举也将与女院和女性学系的英明一起载入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的史册。

建设一个好院系的关键是建设好学科，这是院系安身立命之本，而学科的制度建设和理论创新则是学科建设的两翼。理论创新是方向、是灵魂，没有理论创新就谈不上学科的进展；制度建设则是理论创新、成果累积的体制化形式和渠道，没有学科制度建设就难以巩固和实践理论

创新的成果，两者是互为依托的。我们真诚地希望女院和女性学系能继往开来，在国家实施“两个一流建设”及“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这个战略当中找准自己的定位，举全院之力建设起一个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女性学，设立女性学硕士点、博士点，建设完整规范的学科建制，同时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学基本理论，推出一批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和一批有份量的学科带头人。我们认为这是女院女性学系的优势所在，也唯有中华女子学院才能担当起这一重任；我们相信这一目标在女院的领导和全院师生，特别是女性学系的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我们衷心地祝愿女院女性学系在新的征程中续写新篇章，再创新辉煌，谢谢大家！

禹燕女士

中国妇女报社 副总编辑

尊敬的刘院长，魏主任，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出席这个盛会，首先我代表中国妇女报社、代表华海群社长对女性学系建系 15 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我也要向为女性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贡献各位老师表示诚挚的敬意！

15 岁，对一个女人来讲真的是一个豆蔻年华，也是一个梦想开花的年纪；15 年对一个事业来讲，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15 年来中国妇女报见证了女性学系发展的每一步，女性学学科建设的成就从一篇篇发表在我们报社上的论文就可以看出来。这些成就里面既有理论的探讨，也有现实的关切；既有对历史问题的分析，也有对一些政策的建言。

从我们记者的报道当中可以感受到女性学系的老师们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切。每当有重大的社会热点问题出现，我们总会想到要请专家学者来发言发声，我们的记者首先就会想到女性学系的老师，所以有时候我们总编会说“你们是不是采访女子学院的老师太多了一点”，这也说明她们确实在这个领域权威性。

此外，从妇女报社工作的女学的新一代人身上，我们感受到女性学系培养人才的实实在在的成果。我们现在引进了女性学系的学生，表现

非常好，说明女性学系培养人才有方法、有成果。

今天，是建系 15 周年，我觉得举行这个研讨会特别有意义，一方面是对女性学学科建设的一个成果巡礼，另一方面也是对学科建设的未来展望；同时今天还有一个主题是性别与公共政策，这体现了女性学系对政策的关切。来参会的各位专家学者都非常有名，在各个领域都是有建树的，这个研讨会肯定能够对公共政策的制订实施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创新的年代，女性学的知识生产需要思维的创新，女性学的传承需要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也需要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的创新。公共政策的变革和完善，既需要各位专家学者睿智的见解，也需要上下的贯通，里外的迎合，形成一种合力。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在女性学知识的生产、传承和传播当中是一个桥梁和纽带。因此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这个盛会，并借此介绍一下妇女报这些年来对女性学发展所做的一些努力，表达我们的一些愿望。

中国妇女报是我国唯一的女性主流报刊。我们一直坚守性别平等原则，关注性别平等，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多样化的办报策略。现在我们有三个定位，一是“主流+特色”，二是“工作+生活”，三是“智库”。尤其在新媒体时代这个新闻传播越来越碎片化、表浅化、速食化的时代，有深度的、有品质的新闻内容是一份报刊立足的重要方面，所以这些年来我们有一种理念，就是要努力的推动学术的新文化传播，用新闻的方式和手段把女性学的成果传播出去。我经常说一句话，我们那些高深的理论，要让决策者听得懂，让普通的受众听得到。为此我们在 2012 年

创办了新的刊物，在座的很多老师都是我们的作者，我也借此机会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虽然做起来还是很费劲，但是只要我们胸怀梦想、有足够的定力，有包容的气度和谦虚的态度，就能够在女性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生态链中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我们愿意继续为女性学系成果的传播而服务，包括为学生的实习提供机会等等，同时也特别希望在座各位专家学者继续支持中国妇女报，支持我们新女学周刊。

最后，再一次祝女性学系桃李芬芳、硕果累累，祝我们这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女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主旨发言

黄河副教授

中华女子学院科研处 处长

很高兴今天能和我们的新老朋友一起汇聚在这里，共同探讨女性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政策与女性关系变迁等问题。大会的主旨发言分为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我们会请三位教授发言。第一位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谭少薇教授，她发言的主题是“性别研究在香港：社会与高等教育的观察”；第二位发言者是来自密西根大学妇女学系的教授王政教授，她发言的主题是“发展社会性别学的意义及其挑战”；第三位发言者是中华女子学院图书馆馆长、女性学系的韩贺南教授，她发言的主题是“中国妇女学学科建设回顾与展望”。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7月由中华女子学院、美国密西根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共同举办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女性学的硕士研究生班，接下来进行主旨发言的三位教授都是这个班的组织者。

性别研究在香港：社会与高等教育的观察

谭少薇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本科项目 协同主任



各位早上好，我是谭少薇，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课程的老师。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看到很多老朋友还有很多新朋友，还有我们的一些校友。我特别感谢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邀请我来做这个分享，在此，我对他们建系 15 周年致以热烈的祝贺。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这十几年来我们在香港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在香港的一些观察，主要是关于女性学（在香港称为性别研究）在香港发展中跟社会的转变是怎样紧密相连的，作为一个学科在香港的高等教育建设里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即针对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课程的发展给大家做一个简要报告。其次是介绍一下除了香港中文大学以外，其他大学的性别研究的内容。

正如刚才很多嘉宾提到的，性别研究在一个社会里的发展是离不开当地社会文化氛围的，在香港也一样，性别研究与女权运动在香港的开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女权运动在香港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5 年到 1970 年代，是大战之后百废待兴的时期，是香港的经济发展最快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上关注妇女福利和权益的呼声不断的增加，主要是在立法过程中提升女性的地位，关注社会平等价值观，所以当时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如香港妇女协会长期的去抗争在他们的努力下终于废除了夫多妻制。直到 1971 年的时候，香港真正实现了一夫一妻制，在这之前一夫多妻是合法的。我自己做了一个关于包二奶的研究，发现这个现象的发生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文化基础的问题。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社会改变，是 60 年代的“同工同酬”运动。在香港同工同酬一直到 60 年代才提出来，在同一个工种里面，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应该享有相同的待遇。直到今天，在体制上已经是规定同工同酬，薪资表面上是平等的，可是在很多不同的行业里面，尤其是在私人企业里面，问题还是很明显。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些数据表明我们还是没有达到真正的同工同酬，当男性能够赚取 100 块钱，女性大概只有 60 到 70 块，还是停留在不平等的地步，所以还是需要努力。另外，在法院里面对司法程序的时候，女性往往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因此 70 年代我们推动了强奸案审讯程序的变革。同一时期，妇女协会一直在推动怀孕权益的问题。

第二阶段，19 世纪 80 年代的重点转移到女性的公共参与。因为

我们发现第一阶段的很多困难，并非立法就能解决，而是必须有女性的社会参与，让大家都明白女性的角色都体现在哪，女性的价值观怎么样才能跟男性的价值观融合。觉醒的女性不断增加，尤其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如大学毕业的中产阶级女性，不同专业领域的女性。此外还成立了很多的非政府组织，它们特别关注女性主义理论如何运用于社会。不同的组织关注的内容不一样，比如妇女生产的权利，她们如何面对家庭暴力和性骚扰等、政府怎么理解公民地位，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妇女需要面对的问题等等，多方面的问题代表了不同阶层的利益，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也开始了关于香港的未来的中英谈判，这是 1982 年到 1984 年间最重要的讨论。女性运动在这一阶段也做了很深刻的思考，比如在这种很重要的社会变革的时候，女性主义能做什么呢？当时在大专院校里面，性别研究课程的开设与发展是不同的，比如将学科建设的要求和个别的其他课程联系，绝大部分女性主义学者都是一些独立的教学人员，所以在自己的学系里面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在推动性别平等方面通常是放在自己讲的那门课里面，也通过指导研究生进行相关论文研究来推动这种概念的改变，因此在个人层面的影响要比较大一些。很有趣的是这批女性主义者是 80 年代在社会不同层面推动性别平等的一些人，到她们年纪大一点的时候都已经进入各大学里面做教学人员，有一个角色转移的现象，所以她们的女性主义观点是反映在她们课程里面的。值得一提的是，1985 年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当时香港中文大学有一群学者觉得单打独斗很困难，因此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性别研究计划，通过专门的研究来理解社会文化里面的性别问题。

90 年代开始思考的是性别其实是一个社会文化概念，我们关注的不光是一个学科建设，而是一种公民权利的体现。所以性别平等当时也因为社会发展的情况，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两个很重要的议题，一个是香港男性在中国大陆包二奶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港商在中国大陆投资做生意，很多香港男性就在中国大陆包二奶，在那个时候，男性包二奶算不算犯法，要不要立法来制止这类现象的发生还没有一个定论这个问题一直在被讨论。第二个很重要的议题是女性是否应该跟男性一样有相同的遗产权。香港从地理上分为三部分，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新界的妇女跟男性立法基础是不一样的。一直以来新界条例认为新界的传统需要保留，即新界的男性遗产也只可以传男丁，这样女性就没有遗

产的继承权。经过一个很大的社会讨论，1994年修订了新界条例，100年来都没有改变的继承法终于改变了，确定了新界女性跟男性一样拥有继承权。

大概到1994-95年前后，基本上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对性别平等的认同，所以1995年开始对性别歧视立法了，从此基于性别的歧视是犯法的，这成为了一个社会的共识。1996年也成立了平等委员会，专门执行管理条例。在90年代出现的重大转变也为我们的高等院校中成立性别研究学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机遇。1997年终于成立了性别研究课程，提供了本科生的课程，第二年成立了硕士研究课程，几乎同时香港其他大学的妇女研究者也成立了他们的妇女研究中心。

在香港，香港大学成立最早，历史最长，也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龙头，可是校方只是将性别研究放置于亚洲研究中心，只关注科学研究，所以正式的身份并没有带来经费和行政的支持，我们的同仁都是在自己教授的课程里面包含一些性别研究的观点。其他的大学情况也差不多，比如理工大学，接受访谈的老师反映性别视角的课程配不上修课内容的话就不能开展，而且还有一些行政的问题，像课程时间表都填满了不能开，或者学生的工作量已经很繁重了也不能开。只有我们几个人坚持下去，每年我们都去申请，今年不行明年再来，明年不行后年再来，坚持了六七年之后，学校终于同意增加某一个关于性别研究的课程。可是因为我们有市场的机制，就是学生不够的话，当年的那个课程也开不成，也需要取消，所以对于老师来说，制度上很多问题需要跨越。像香港科技大学以科学、工程、商科为主，以男性为主，男性比较能够把持一些主流的研究，我们要突破这种困难也不容易，所以一直以来，没有一家香港的大学能有独立的女性学，从这方面来讲我们是很羡慕中华女子学院有了自己的独立学系。课程系统里面虽然有这一类的行政问题，可是也因为我们很重视学术独立自主，很重视老师自主，以及在教学方面的自主，所以我们在课程内容里面能够自由放置性别研究相关内容，比如说增加性别纬度。现在的情况是性别研究空间比较大，主题也比较多样化，比如说LGBT的研究，滋病、跨国移民等，可以看到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有很密切的关系。

在此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发展。从1997年成立，到1998年就有了硕士，2002年是博士跟文学硕士课程，2002年跟中华

女子学院、北大密切的合作之后，又跟密西根大学办起了学士后文凭班，2012年我们就开始了科学学士课程，终于有了我们的主修课程。我们希望继续在跨学科性别发展方面，经过社会运动来改变文化价值观，推动性别平等。刚才各位专家都谈到，两者缺一不可，没有社会文化价值的改变是无法推动性别平等的，没有理论的建设无法推动性别平等，因此我们是培养学生在历史的视角下，在对当代问题的关注下，通过所学知识变这个社会性别关系的现状。

另外值得一提的一点是，从课程上我们有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律等等很多的学科，可是我自己觉得这只能说是一种多学科的建设，还没有到达一个跨学科的建设。我们有一个愿景，希望性别研究能给社会、给文化带来一个长远的、和谐的、真正幸福的状态，这种状态必须要通过性别研究才能达到。我们跟学生也是这么说的，我们不光是来念书，也有更重要的社会责任，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推动使大家形成互相尊重、多元平等和全球视野的性别观念，作为一个高等院校，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推动前人的研究以及用高水平的教育来达到这个目的。

关于我们的老师，有来自心理学的、人类学的等等。我们的老师的研究是多方向的，我们的课程内容也是多元化的，给学生创建一个全面的视角。我们的研究生也不多，每年只有四五个，或者五六个，有时候幸运的话有七八个。尽管如此，在这十几年来，我们也累积了一些毕业生，在社会上也有一点点的影响。他们念完了硕士博士之后，在不同的企业里面做人事处的工作。人事处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各企业在招聘的时候必须要关注性别平等，在工作条件上必须要关注性别平等，所以性别研究的毕业生在这一行业是很有作用的。另外，同学们在念完会继续到英美去深造，在香港的一些大专院校里面演讲，形成很好的社会文化学术的生态。

最后，我还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受制于两个导向，第一是外围导向，第二就是市场导向。除了学科的认同，除了社会的认同，我们还面对吃饭的问题，因此毕业生能拿到什么样的工资，是我们面对的重要问题。包括学生实习的机会、海外交流的机会，都必须要配合当代的教育需要，我们还得要不

断地去找这个资源。在研究生课程方面，我们很多的指导老师是义务帮忙，在性别研究课程里是一个义工、是志愿者，要怎么样解决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呢？还有就是行政与研究，我们的老师怎么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推动性别研究，怎么样推动跨科技的一些研究，让学生可以明白性别研究是多方位的全观的研究，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是要紧密连接社会改革，持续进行性别研究和教学，不仅仅是在社会上不断的推动。我们发现在大学里不断地需要解释为什么需要性别研究，从这点我们就能够看见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认为女性不重要，这是一个价值问题。

最后，我还是要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香港性别研究的发展过程，我希望通过这次交流，能够继续合作，在两岸四地一起携手把性别研究发展下去，谢谢大家！

发展社会性别学的意义及其挑战

王政教授

密西根大学妇女学系



非常感谢中华女子学院的邀请，使我有机会来参加极其有意义的、学术界的一个盛会，也很高兴看到很多老朋友，更高兴看到有年轻人的面孔，老中青三代汇聚的场合，说明我们女权的学术事业是后继有人的。前面的专题发言让我极其兴奋，因为我在过去 20 多年里也参加过国内各种各样的学科发展、妇女研究的研讨会。他们往往都是请一些学校的领导，当然一般都是男性，开幕辞一般都是在妇女是很重要的，家庭需要母亲、妻子这样一个层面上来说一些祝词，而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相当高水平的致辞，高瞻远瞩的发言，所以我非常兴奋。

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时间先来做个简短的历史回顾，来说明一下我跟中华女子学院是如何结缘的。最早是在 1998 年，孙晓梅老师给我发了个电子邮件，说关于女子学院和加拿大大学的参观请我帮个忙。当时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妇女研究所做研究员，没有授课的任务，所以有时间来组织这个对美国、加拿大以及中国的十多所高校的性别学科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参访。当时的回院长是一位想干实事的领导，在接近三周的访问过程中一路上对我提出许多问题，表达了他的两个关注点，第一中华女子学院如何发展有女性特点的教育（要注意，这是 1998 年）。第二在高校如林的北京，刚刚进入高等教育体系的女院如何能与其他高校竞争，谋求在高等教育界的学术地位。而我的回应收到小梅的电子邮件后就已经准备了。首先，以前都是男性主导，19 世纪末才让女性进入高校，让女性进入高等教育其特点当然是要因才施教，比如美国女校已成为培养妇女领袖人才的场所，这是对他第一个关注点的回答。第二，我认为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作为改造知识生产的新兴学科领域，在欧美高校蓬勃发展，已经对西方高等教育和学术界以及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中国高校的这方面尚有待发展，如果女院在此刻投入妇女学学科的建设发展那就是在高等教育界的抢滩，那就可能在新兴的学术领域方面占据前沿的位置。

访问结束后不久，回院长为此专门和我面晤，要求我继续支持发展目标，于是在 2002 年我们在中华女子学院举办了由密西根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华女子学院三方合作的国内第一个妇女学会班，为期三个寒暑假。选择在中华女子学院、选择高层次的师资办培训班是有我的内在逻辑的，当时全中国只有中华女子学院的书记、院长是女性，她们

不只是院长书记，还是有女权觉悟的女领导。并不是女性就会推动女性的事业，我也组织过中国的高校女书记、女院长到美国去参观，但是这种游说活动、兜售往往并不见成效。

此外，我当时也很清楚，妇女学要进入高校体制，尤其是在中国的政治制度框架下，它必须要有领导的强有力的支持，否则是进不去的。而中华女子学院本身就是老一辈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开拓的教育空间，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以推进男女平等的坚定的使命感来维系、巩固、扩大这块妇女的阵地，所以中华女子学院成为推进女权主义改造教育的场所是名正言顺的，而妇联系统对这个新兴学科领域的支持则为我们在全国高校推动妇女性别学学科发展提供了政治上的合法性。1999年我们已经跟国内的好几个学者有了交流，杜芳琴老师和张李玺，也是我们推进妇女性别学发展的非常有力的成员。

前面是回顾一下历史，在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在中国推动这个学科进入教育体制的艰难，也更感慨中华女子学院的领导和教师们把妇女学体制化的难能可贵，在此我对开拓和坚守这块阵地的所有老师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国际上，在过去的40多年里，随着女权主义的运动在全球的迅速发展，社会性别研究从学科体制到学术理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学术体制发展来看，全球各地都建立起妇女社会性别学教学机构，授予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的专门学位。从数字上来看，美国有将近700家高校都有妇女学教学机构，其次是欧洲，之后是南美、非洲和中东、亚洲、澳大利亚、新西兰。专门的跨学科的妇女社会性别学硕士博士点还是聚集在欧美。1998年美国大概还不到10个博士点，上一次统计的时候就增长至24个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大包围这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大环境，在这个大环境下，在整个的意识形态全球走向保守、新自由主义上升、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美国是如何继续推进的，能十多年之后有这样的成就。当然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进步，我们的GDP今天是排名第二，我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但是我们在学术上、社会文化上并没有蓬勃发展。我们女权主义已经非常努力了，但是这样一个局面摆在大家面前，相信大家今后很多的讨论都会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比如学术刊物的统计情况，只统计了英语的学术刊物，并没有统计其他的语言（这是在英语世界，在亚洲我们统计了汉语）。我们可以发现，英语世界早在16年前就有150多种学术刊

物了，各个领域都有社会妇女社会性别学术刊物。

在学术刊物的发展上，学术项目、教学体制的推进和硕博点的发展上，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它既同其他国际学术思潮密切交融，又同各种学术运动息息相关，理论和实践是辩证的、相互推动的关系。在西方的少数族群和非西方的女权主义学者和活动份子都积极参与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这点我今天需要特别强调一下，因为我关注到国内的一些言论，有个别的言论好像想把社会性别当做资产阶级的东西来讲，老是拿一些论调出来想用术语来把女性主义的努力打压下去。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这个早就不是白人妇女政权的专人特权了，来自美国社会边缘群体的学者指出，把研究的焦点聚焦在单一的女人身份上，其实是暴露了白人中产阶级女权的特点和权利地位，任何人都不会只有社会性别身份，社会性别的身份总是与其他身份交叉镶嵌或者是相互构成的，换言之不存在抽象的只有生物性的女性。尽管女人有相同的生殖系统，全世界大部分的女人生活在男性主导的生活中，但是每个女人都处在复杂结构的交叉点上，她们的人生经历是由她们的等级结构所决定的。因此，改变多重等级制是女权主义学术的目标。

妇女社会性别学发展的历史，证明了女权主义的许多学术概念有力地挑战了男性的知识生产，发挥着改变人类知识觉悟、认知觉悟和改造既有的不平等权利关系的作用。1985年我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美国史，那时候已经开始用种族、阶级分析多种权力关系和等级制度的理论框架来组织历史学说。30年后的今天，我看到这些分析框架随着受过女权主义学术训练的青年人进入主流社会（包括媒体），正在变成公共话语中流通的概念。最近，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性骚扰言论视频暴光了，媒体一片哗然。我注意到40岁左右的以及更年轻的男女（不光是女性）对这件事的反映，大多数都会用女权主义的概念来层层剖析特朗普性骚扰，这成为美国又一次普及女权主义的教育活动。而在过去30年的中国文化中我们看到是明显的逆向行动，网络上许多男性青年经常用侮辱女性的言论来讨论社会事件，而且不觉得这有任何问题。除此之外女青年还承受着再生产的强大的舆论压力，体制内外的中国女权主义者都做了相当大的努力，但是我们依然面临着强大的男权社会文化霸权和日益加剧的各种不平等。这些既是我们推动社会妇女性别学学科发展的阻力，又是我们必须更努力地推进女权主义文化改造事业的动力。

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了各种社会力量的较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祝愿中华女子学院的老师们，不仅要坚守这块可贵的阵地，更要有勇有谋、弃而不舍的继续开拓，把中华女子学院建设成中国女权主义改造知识生产的一座桥头堡，谢谢。

中国妇女学学科建设回顾与展望

韩贺南教授

中华女子学院图书馆 馆长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大家好。我在这里很想说，又见到这么多的老朋友，大家一起做事情，一同走过来，真是感慨颇多。据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2006年至2007年左右我们还是比较关注学科建设的。那个时候关注的大概有两个纬度，一个是制度，制度就是学理上的，另一个就是建制，建制就是平台，学习、刊物等等。当时我们对学理上的关注也是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妇女学是人学范畴，研究的是女性的本质、存在方式与发展规律；另外一种观点就是我们是性别视角对知识进行改造我今天回顾一下学科发展的路径，即制度与建制。

根据我们系里合又分的这样一个路径，就建制上来讲，女性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纬度。因为最近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妇女理论，我引入了一个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概念，看它们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还用了一些政治学和国家的概念以及社会主义的理论来观察这个关系。作为亲历者，我的方法和经验当然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把我的发言定位在探索性的方面，也是一个研究框架。

对于“嵌入”的概念我简单地回顾一下，它是40年代经济社会学家波兰尼提出来的，他看到经济社会经济发展似乎要脱离社会这样一种脱嵌的现象。就像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纯遵循市场的活动，就有很多弊端。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嵌入”概念在当时是很睿智的，且对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来说，仍然是一种很好的学者的忠告，但是他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思想，“嵌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后来又有经济社会学家格兰挪威特用“嵌入”概念研究具体的微观的社会关系，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强嵌入”、“弱嵌入”等等概念。我们国家也用“嵌入”概念来研究社会现象，北京大学的王志斌教授写了很多文章，而且提出了研究“嵌入”概念的一些框架，比如：谁是“嵌入”的主体，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嵌入效果怎么样，嵌入过程怎么样，对两种社会现象或者多种有社会关系的社会现象有什么样的影响等。我觉得这个概念挺有意思的，就用来观察我们系里的发展，这是我的一个视角。

在回顾各历史阶段的女性学时，我就以建制的月份为特点来划分历史阶段。建制上我们是2000年的3月从社会工作管理系独立出来的一个实体的妇女研究中心，一年之后我们就成立了女性学系，即2001

年 8 月挂牌女性学系。我的时间点没有向前回溯，但我觉得在此之前的整个演变是很值得研究的。学理上，我认为中国的女性学不是 95 世界妇女大会的社会性别引进后才有的，本土在 80 年代就有这个概念出现，而且有自己的研究框架，那个时候我们一概称为妇女学，因此我们的学理背景是 80 年代的中国妇女学。任何一个学科的产生都遵循着一般的规律，它都要回应一些问题，尤其是社科。那我们妇女学回应的问题是什么呢？它回应的是：在当时，妇女生存环境大地震、被下岗，该怎么办呢？当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传统妇女理论，所以我们想建立妇女学。95 世界妇女大会之后，我国成立了很多研究中心，我们学校也成立了研究中心，成立了女性学系。我们是建制在先，制度在后。更细微的问题是课程设置上的改变，我们三门课程合并成女性学导论并推出教材。建制带动制度，我们把女性学导论课程变成面对全校的公共课，需要厘清学理论，所以这个阶段我们推出了很多教材，开始界定我们的学科。我们在教材中引入心理学视角，将社会性别作为一个方法，内在的知识体系是按照 95 世界妇女大会的 12 个和平领域建立的。

第二个时间点，就是女性学本科专业的创立。经过 2005 年申请，2006 年获批并于当年招生，在此，感谢王政老师跟谭少薇老师两位的鼎力相助，她们的帮助对女性学系的发展和本科专业的招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们这个班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既是组织者又是学员，谁也没系统学过性别研究的课程；学生来自全国各地，都是高校的老师。我们原来就有公共必修课（行为艺术、历史展现），2004 年开始办辅修专业。这也可以看出女性学的发展跟其他学科不一样，是跨越式发展。什么叫跨越式发展？一般是有主修才能办辅修，我们先办辅修再办主修。大家看学理和建制之间大家互相推进的。按理来说是有有一个契机的，就是本科教育评估，我们学校进入高等教育体系，我们怎么样在这里面立足，我们怎样打造自己的特色？那个时候正在进行本科教育水平评估，因为我是系主任，要经常到处游说，但是申请办专业都被本科教学委员会驳回来了，就告诉我，“你们有两个口绑不住，一个出口一个入口”。本科教育水平评估，评估各校的特色，我们学校也希望找到特色。我记得在 217 会议室，有一位教育局专家，他说“你们女性学是女子学院当家专业，就像民族大学的民族学一样”，我们听取专家的整改意见，马上申

报女性学本科专业，开始论证，就这样成立了本科专业。

还有一个阶段 2008 年女性学系进入二级学院。进入二级学院这个过程明显的表现出在建制上女性学系和其他学系的关系，学校从整体发展要强强合作，各学科都要运用女性学来打造各自的专业，所以我们进入了二级学院。但是我认为水涨船高，女性学的蛋糕做大了对学科才好，所以在建制上我是有想法的。今年女性学再次独立成系，分合交错的过程当中，在建制上体现出是以独立为主，它自身成长的一个内在的魅力是阻挡不住的。另外我认为嵌入主流是主要的方面。王政老师讲这主流的嵌入会有什么？可能会发展出一些中层的概念，比如政治上的合法性，力量的凝聚等。总而言之要嵌入主流，起码在女性学发展的历程上，在有一个建制与制度并行的道路上，我们的建制先行了一步，而制度建设需要外援，这是我们的发展路径。所以我就说这个“嵌入”中心的问题，王政老师刚才提到的“大家都来支持女性学系”，是因为我们这儿是真的中心，把性别研究当中心；你一“嵌入”中心就带来快速的发展，而“嵌入”旁边则发展的慢。我认为学理上我们走过了一个独立到开放、再到跨学科的过程，但是跨学科之后，我认为现在应该仍然谈学科。因为至少这在中国本土上，没有知识领域一切就面谈。女性学是一个学科，我们的各个学科都是有跨性别视角的，但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把这些研究学科分出来再进入体制。我主张中国妇女学流派发展的队伍要承前启后，当然继往开来也很重要，要凝聚起来，继续推动中国特色妇女学的发展。

性别与公共政策主旨发言

黄河副教授

中华女子学院科研处 处长

谢谢三位教授，她们都有很多的个人感受，都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性别主流化以及学科建制的问题。谭教授更多地描绘了香港性别研究的历程，如何在关注社会变革，尤其是性别研究与女性主义运动如何激发在教育领域中推进性别的主流化，以及主流化面临的问题和困惑。由此我们也看到香港的女性主义学者和性别研究学者长期以来一直持续关注在公共领域推动社会变革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使命。

王政教授更多的是从妇女社会性别学的角度来谈，她在学科建制当中，尤其是外在的学科建制谈到，学科作为社会组织的结合体如何去推进主流化，以及在阶级阶层包括文化、经济、市场等相互交织的力量作用下我们在推进性别主流化当中面临的哪些挑战。

韩教授更多的是以我们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的建制为例给我们描绘了学科建制和制度的关系，由此引发我们更好地思考未来女性学学科发展的走向，谢谢三位教授。

我们下一时段的发言有三位学者，第一位是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的副主任吴帆教授，她发言的主题是“家庭政策是否能实现生育鼓励以促进女性就业的双赢？”第二位发言者是来自哥本哈根大学性别研究部的主管 Hilda Roemer Christensen 教授，发言的主题是“性别、交通与可持续发展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与公共政策的干预”。是单位发言者是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贾云竹副研究员，她发言的主题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生育预测的调整”。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她们。

家庭政策是否能实现生育鼓励以 促进女性就业的双赢？

吴帆教授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 副系主任



非常感谢会议主办方的邀请，在听的过程中，尤其是几位女性学专业的开创者的发言，使我深受触动，也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现在南开大学有 11 门关于性别的课程，我们的性别研究基地正在推进这个性别的课程，就教学的发展而言，我觉得跟你们比起来我们要努力的空间和提升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今天跟大家汇报的是关于家庭政策方面的研究，如果说前一时段的主题更多集中在女性学的学科建设上，后一个阶段的主旨主要是性别与公共政策。

这些年我一直非常关注家庭政策，在二孩政策放开之后，我们有很多的议题或者疑问：二孩政策的放开会不会给女性的职业发展带来进一步的发展风险，会不会创造新的性别不平等？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希望能够去探讨一下家庭政策是不是可以促进生育鼓励的实现，因此生育二孩以及女性就业的双赢是我主要的研究内容。

第一，新政里面有很多的性别议题。在微观层面上，生育的决策权在慢慢地回归家庭。在宏观的层面上，因为人口结构的失衡，国家调整了政策，它希望达到人口均衡发展的宏观目标。但是这依然存在着一个潜在的风险，即二孩的生育成本主要是由女性来承担的，可能会进一步加重性别失衡。也就是说现在大家普遍出现了一个担忧，或者是新政遇冷，即：女性愿不愿意生育二孩，因为生育与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是直接相关的。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发现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普遍降低了，已经形成一个生育意愿和生育力非常低的社会经济环境。而且生育孩子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密集型和人力密集型的活动才能够实现的，女性要生孩子就必然会对她的职业发展带来影响，因此家庭政策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比如托幼服务，也就是说二孩政策放开以后，零到三岁的孩子交给谁来管，谁来帮助你去支持家庭生育的决策。这对女性平衡生育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研究者纷纷从家庭政策里寻找破解之道。家庭政策是不是一定会鼓励生育和促进女性就业，这是我希望今天能够回答的问题。

生育的过程会给女性带来很多的职业发展风险，可能会造成职业发展的中断，也可能会造成职业发展的恶势积累。一个西班牙学者的研究显示，西班牙的母亲要花九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到中断工作之前的工资水平；另外，女性承担了大量的照顾家庭和养育孩子的责任，也会对她

的职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会发现，即使是她的职业不发生中断，生育后的一年到三年是她高负荷的时期。女性会怎么办呢？她就会选择改变工作时间或者是性质来缓解抚育孩子的冲突。我们现在有两个机制可以解释女性劳动参与的下降，一个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另外一个一个是生育代价。如果从性别的角度去解读生育新政遇冷，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其他不好的后果，有可能国家希望均衡人口结构的目标没有办法达成，因为在微观的生育基础决策过程中家庭不会想要二孩，而有可能被动选择生育二孩的家庭可能会遭遇新的不平等。如果要解决这样一个负面的后果，需要从预期的负面后果来看如何降低这些负面效应，来看家庭政策怎么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

我想给大家看一个图。这个图展示了家庭政策如何影响生育政策。分成两大块，上面是传统支持，下面是比较现代意义的家庭政策。传统支持通过儿童的补贴、结婚的补助、家庭照料的补贴，能够提供女性在家庭照料的机会，能够补贴这种生育孩子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下面的框架实际上是更多地支持女性的双重决策（也就是作为母亲和作为职业女性的双重角色），它提供更多的带薪产假、育儿假，不同的政策手段影响的主要方面、结果是不一样的。它影响家庭收入，影响孩子照料的性别分工和在劳动力生产上有酬的性别分工，最后作用于家庭的决策机制：我生育几个孩子，我要不要孩子，要生的话生几个，我的生育间隔是多远。

刚才那个图中的影响机制中，我们可以看到更为现代的家庭政策的导向，或者说更为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导向，它就是我们讲到的如何实现双赢：女性既能够有一个生育的支持，同时女性的劳动就业率和就业的质量又不会下降。现在有一些欧洲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我们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借鉴。欧洲的家庭政策主要在三个方面激励女性，第一个是促进女性就业，第二个是降低收益的成本，第三是改善儿童的成长环境。另外，我们会发现就算是 OECD 内部和欧洲的国家内部，因为家庭政策的导向不同，对女性的激励的差别也是非常大的。

针对这些不同的国家，我特意拿出五个国家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国家是希腊，它的家庭政策整体是比较弱的，女性的就业率和男性的就业率差别比较大，它的生育率也很低。然后是德国，德国的生育率比较低；之后是丹麦、芬兰、法国，他们的生育率高，女性的就业率

也比较高。这样一些不同的欧洲国家和 OECD 国家的家庭政策、生育率和劳动参与率的现状给我们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东西：如果家庭政策只停留在直接对母亲和儿童的支持，不会有利于女性的事业发展！除了提供直接的支持，更应该关注工作与家庭的平衡，系统地去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才能降低女性的发展风险。所以从国际经验上来看，我们应该实施生育鼓励和促进女性就业双赢的家庭政策。

最后，我想分享一下如何从组织或者就业单位的层面去构建一个工作与家庭平衡的政策。现在有学者做了一个总结：从时间弹性、子女照顾、家庭照料还有财政支持这几个方面来操作，可能会直接的促进就业和鼓励生育，起到一个双赢的作用。谢谢大家！

性别、交通与可持续发展 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与公共政策的干预

Hilda Roemer Christensen 教授

哥本哈根大学性别研究部 主管



首先非常感谢中华女子学院邀请我来这里，也很荣幸聆听前面各位专家的讲话。我在过去的十年间在中国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会议，因为丹麦和中国在公共政策方面也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今天我要讨论的话题是“性别、交通运输与可持续性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公共政策干预”。

十年前，我来到中国时，当时的中国跟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十年前的中国还是一个自行车王国，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汽车王国。在我来到中国参加这个会议之前，我预想的情况是大家都骑着自行车，然而现在我发现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几年前我发布了一个刊物，刊物的名称叫做“性别主流化、欧洲交通运输和政策研究”。我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性别主流化，其一是交通运输实践，其二是交通运输是人类市场，其三是政策制订，其四是文化与价值观。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交通运输的研究中主流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模型里，大家运用了大量的定量数据，然而这些定量数据中并不包含个例，也并不辩证，其中大部分是以男性为主的，不包含女性的部分。第一，我们可以看一下出行的特征，女性更多的集中在家庭生活方面，比如出门购物，和男性相比会有更多围绕着家庭的交通运输需求。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在交通运输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当中，更多地考虑到男性的需求，所以在建设各种高速公路、公共交通和自行车道的时候，我们更多地考虑到了男性视角。第三点，在文化和文化常态当中，也是男性占主导地位。第四点，我们可以看到在污染和天气方面，女性和儿童对气候更加敏感，然而她们所占有的资源使她们必须更多地忍受这些气候和资源方面的劣势。

我在几年间做了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和访问，包括亲自到各种 4S 店和自行车店，采访这些车店的主管以及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些问题，即接下来我将要介绍的两种性别分配不均，第一个方面是汽车文化，第二个方面是新兴的自行车文化。

首先来谈谈在汽车文化方面存在的性别分配不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汽车持有率正在逐渐稳步上升，尤其是北京地区。但是从男性和女性的驾驶率和汽车持有率及来看，2013 年女性驾驶员只占 20%，而男性占到了 70%到 80%。即使女性的汽车持有率有稳步提升，女性驾驶员

的占有率一点也不高。在驾车文化方面，现在我们有两种不同的男性化形象，分成文武两种。其中武的形象是指这些驾驶跑车的，更加强壮，更加男性化，是一种更加有攻击性的男性形象。文的形象是指主流媒体当中中产阶级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形象，这些男性形象更加温文尔雅。而女性形象也分为了两种，一种是非常浪漫的、并且偏向家庭化的、多数使用家庭型汽车的女性形象；另一种指向物化了的，有着性形象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在公共交通方面性别仍然是不平等的。比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国家，女性所依赖的公共交通设施，例如公交车，它的环境是非常拥挤且不舒适的。

其次来谈谈自行车文化。30年代男性还把自行车视为一种炫耀的工具，家庭四大件当中包括著名的飞鸽和永久牌自行车，到了2011年左右有一部非常重要的电影叫做《17岁的单车》，其中涉及了北京的自行车文化。让我们再来看看北京的自行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发展，在1980年到2001年期间，自行车的使用率从60%降低到12%，原因之一是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率及覆盖率有大幅的提升，然而由于公共交通的环境仍然太拥挤，所以现在自行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在近年来又重新兴起了。我的问题是中國会不会重新作为一个自行车王国崛起？这包含了我在近年来观看的妇女日报、中国日报等各种中国媒体及西方媒体中关于自行车崛起的性别观念。我发现有趣的是妇女日报仍然是从一个集体化的视角进行报道，把自行车作为一种新兴运动和一种中国的健康新兴模式进行报道，然而西方文化是从独立的消费者视角来报道自行车文化。我们发现70%到95%的自行车用户都是男性，他们将自行车作为一种运动开始重新流行起来。我还看到自行车文化当中中国女性所占的比例之低，当然可喜的是我们在奥运会当中看到了许多优秀的女性自行车奥运冠军，我的问题是中國女性在新兴的自行车文化中的角色是什么？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生育预测的调整

贾云竹女士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副研究员



非常感谢这样一个机会，今天看到这个标题我很有感触。我是 2001 年进入全国妇联研究所的，今年也是我在妇女研究所走过的第 15 年。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是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我自己的学科背景是人口学，也一直性别与老龄化这样一个议题作为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关于老龄化的议题和性别怎么去对接，对接什么样的思考？我从这四个方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第一个是关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达成一个共识，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大家追求的、成功的结果。因为大家都在追求健康而长寿，所以它是整个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它的产生是一个共识，一是生育率的下降，婴儿死亡率下降，社会经济现代化，包括女性社会地位提高这样一些综合的因素，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进而整个导致了人类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变化。二是平均寿命的延长，这也是公共卫生事业的一个巨大的发展。很多疾病得到控制，人类寿命延长。在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年轻人的死亡率下降导致了平均寿命的增长，这个贡献更大；而在发达国家，中老年寿命的提升对平均寿命的延长贡献会更突出一些。

我们国家的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是叠加在一起的，很难分开。生育政策调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人口生育率在 1990 年左右就降到了 2.1，这是国际上公认的所谓的人口正常替代水平。在这样一个水平之下，从 50 年代一直到 70 年代我们的生育率就一直在下降，现在就是处于一个在人口学界通常会说的超低生育率的阶段。官方公布的具体数字在人口学界有很大的争议，到底是 1.14 还是 1.8，又或者是 1.55，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处于一个低生育水平的状态，这是无可辩驳的，因此我们现在的生育政策要调整。中国的发展使我们的平均寿命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相对全球而言，中国——一个那么多人口的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提升了人民的平均寿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成就。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口结构，从 60 年代开始一直到 70 年代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年轻人和少年儿童的比例很高，老年人的比例很低，但是进入到 1999 年的时候，60 岁以上的人口达到了 10%，65 岁以上的人口达到 7% 左右，这是国际上进入了所谓的老龄社会的标识。人口学界当时就提出我们的生育政策应该有一个及时的调整，以免持续的、紧

缩性的生育政策导致人口结构的不均衡，以及对现代计划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一个预测数据，到 2050 年，我国的老年人口（就是 65 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27.5%，少儿只有 13.5%。其实无论哪个老龄化国家的数据拿出来看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老年人口中女性是占更大的一部分。我们的研究也发现，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老年人口当中的女性比例还会有一定幅度的上升。就目前的数据做一个预测，女性在老年人口中的占比现在是 51.3%，而到 2050 年将会上升到 55% 左右，在高龄人口当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大。这也是很多组织，包括联合国机构还有我们，一直在呼吁针对老年人口制订政策一定要有女性的视角的原因，否则女性面临的特殊问题得不到关照会产生更严重的问题。这也能够看出我国老年抚养比，这是衡量老龄化问题会用到的一个指标。现在是十几个人来支持一个老年人，到 2050 年就只有两个人来支持一个老年人，所以如果我们继续坚持现行的这样一些公共政策或者制度安排而不加以改变的话，以后老年人的抚养就会面临非常巨大的困难。

接下来想跟大家谈谈，我国现在提出的一个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顶层设计，以及国家在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制订方面这些年走过的历程。我国其实在 1999 年就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社会，也引起了中央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而且到目前为止中央已经有了好几个与之相关的最高级别的文件，如 2000 年退出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现在持续谈老龄化的问题，而且谈论的越来越频繁，大家的关注点越来越多。

这是在刚刚过去的“十二五”期间，中国在养老体系构建上的一些概括。首先，《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十二五”期间进行了修订，相对于之前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细化了一些内容，对老年人的权益，包括社会公共服务的体制这种大框架的构想，在法律当中有了体现。其次是两个重要的规划，老年人的事业发展规划和养老服务的体系建设规划。2013 年也被称为中国的养老元年，国务院发布了 35 号意见，围绕着 35 号意见的文件和法治法律条文出台显得很频繁，以中央国务院为核心的各大部委和涉老年人机构也都是频频地发出涉老政策，地方上这样的现象也非常频繁。目前养老政策的发布呈现出井喷式的状态。就相关的部委而言，民政部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老年人的各种福利，包括养老院、养老服务等，一些设施和机构都是由民政部牵头。其次是人社部，

因为涉及到社会保障；保监会也有所行动，金融方面的养老市场开放也是一个热点；卫计委，医疗卫生也是重要相关部门。可以说我们国家的各大部委的各个职能部门，包括妇联系统，对老年问题都有很多的关照。根据 31 个省现在的老年人政策的实施情况来看，有高龄津贴，通常是 80 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个月或者是一年会有一些补贴；有互利补贴，针对失能失智的老年人，为他们提供互利补贴，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还有养老服务补贴等。这都是目前我国在养老制度落实方面的一些进展，我们也看到这三项政策有 14 个省区都已经落实了，6 个省区落实了两项，8 个省区落实了一项，还有湖北、江西、广西这还都有待推进。总体而言，在养老服务或者养老政策的推广实施方面，在全国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步伐都是非常快的。

在“十二五”纲要里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专章——65 章，专门讨论积极应对老龄化，它把应对老龄化上升为国家的政策战略，在我国现在最核心最重要的文件当中，也是有 27 处之多涉及养老这个话题。我们看到在当时的规划中，在中央所提出的这个体系中生育政策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的部分。生育政策的调整和人口老龄化其实在人口学界有很多的探讨，比如两者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要放开生育政策、对这个政策进行调整，最终的目的在于优化人口结构，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要增加劳动力人口，降低抚养比。在微观层面上也可以消减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负担，降低失独家庭的风险，还有可能增加家庭养老资源。

这是我国生育政策从 1960 年到 2015 年的演进过程。1960 年提出生育试点；80 年代是施行刚性政策，即一孩政策，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例外，严格的一孩政策只在中国的部分省区执行；90 年代实行单独二孩政策，2013 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2015 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到 2017 年全部放开二孩政策。全部放开是大家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如果不放开我们最终达不到 2.1 的生育率水平。很多学者对生育政策调整之后我们未来的人口结构做了一些预测，如果不调整的话就是蘑菇云，调整之后可能就稍微好一点，对社会经济的冲击和压力没那么大。生育政策的调整，首先会适当地缓解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其次会改善家庭的人口结构。

关于新增的老龄化人口问题，今后国家的发展策略也是以家庭养老为主，所以家庭在整个养老的战略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很

多人关注家庭政策，因为家庭政策贯穿人的一生，是一个从你出生到你最终老去都涉及到的东西。我国现在提的是“9073”或者“9064”这样的策略，但是我们看其他国家的数据，“7”是所谓的社区养老，可能是被我们臆想出来的，在日本、台湾、香港这些地方真正在社区层面来养老的老人很少，80%-90%都是家庭养老，且在中国大陆99%的人都要依靠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可以是对家庭养老的一个支持。真正的机构养老在我国其实现在才刚刚开始，床位只达到30%，而且真正入住的老人比这个比例要少很多，更何况这个床位大部分是在农村，条件很差。因此我们现在谈论今后养老的很多具体政策落实的时候，重点应该还是要放在家庭这一个层面。

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公共政策，我们也做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也在反思现在的生育政策调整，女性作为育人的入口，她的很多权益没有得到特别强的关照和考虑，而老年政策同样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做宏观高层决策的时候，确实需要的是宏观的数据，但在制订具体政策的时候，应该体现对人的关照，政策应当是一个对社会的发展更有利的一种政策。我们现在提到家庭友好发展，发展性家庭政策，实际上家庭现在的养老能力上被极大削弱了，老年人独居的比例越来越高，老年人获得家庭支持的可能性在降低。今后的政策如果要继续维持家庭养老，就必须强化家庭的养老功能，在税收和住房的政策方面就要有一些措施来支持这些有养老责任的人，让他能够兼顾他的家庭和他个人的工作发展。还有前面提到的老年政策，现在是“9073”这个战略，我们也说到中间的“7”现在是凹陷下去的，是没有得到支撑的，今后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个更符合实际的调整。还有居家养老，现在讨论的特别多，但是真正能做下去的现在也还在路上。时间所限，我也只能跟大家简略的分享到这儿，谢谢。

2016年10月15-16日

女性学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暨公共政策研讨会

筹备组

- | | |
|-----|------------------------|
| 魏开琼 |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系主任 |
| 周志慧 |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党总支书记 |
| 陈 方 | 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妇女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
| 朱晓佳 |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实践教学教研室主任 |
| 范 譞 |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基础理论课程教研室主任 |
| 曲 珍 |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专业方向课教研室代理主任 |
| 王中镜 |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办公室副主任 |
| 李 宁 |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团总支副书记 |